

论伍尔夫创作中的女性主义

吴 敏

摘要：文章立足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结合具体的文本，从觉醒的女性意识、对父权的否定、以及双性和谐的理想境界三个方面来展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内涵。同时阐述了任尔夫笔下女性的独特生命体验以及个体生存的困境。

关键词：女性意识；父权；双性和谐

作者简介：吴敏，女，副教授，硕士。（浙江树人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06）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 (2010) 01-0111-04

伍尔夫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也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者。她的小说无论在题材的选择、小说形式的革新，还是女性人物的塑造方面都体现了女性主义意识。

女性主义文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掀起的新女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从20世纪20年代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开始，到60年代已蓬勃展开。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揭示了一名女作家所处的困境：女性写作的首要条件是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否则在文学史上就难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实，伍尔夫所说的“自己的屋子”，不仅是指女性作家居住空间，更重要的是象征着女性作家身处的文学空间。伍尔夫着重强调，女性作家不但要有自己独特观察和处理事物的角度，而且要有自己独特不同于男性的语言和创作风格。女性作家要建立妇女自己的文学批评标准，为妇女的创作自由寻找自己的一间独立的屋子。女性主义文学的问世使得传统的文学和文化意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

纵观伍尔夫的文学创作，本文从三个方面探寻和发掘她的女性意识，并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内涵展示给读者。

一、觉醒的女性意识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女性作家不是缺乏天才灵感，而是缺乏写作所需的条件，传统压力使女性成为家庭的奴仆，这种奴仆意识促使她们身不由己地为男性操劳服务，失去对自身的价值的体认，最终失去自我。伍尔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道：一个女人要想坐下来写书，“依然有着许多要与之搏斗的鬼魂，许多要加以克服的偏见，除非……去屠杀一个灵魂，去撞碎一块岩石。”^[1]这种“鬼魂”与“偏见”就是男性加诸女性身上强制女性接受的观念与态度。

伍尔夫还提出了关于莎士比亚妹妹裘底斯，和莎士比亚一样禀赋超群，富于冒险精神和想象力。父母把哥哥送进文法学校，却让她呆在家里，剥夺她上学的权力。她也想像哥哥一样做演员，却受到了人们的嘲笑，并且被经纪人引诱怀上了孩子。莎士比亚最后成为伟大的戏剧家，而裘底斯却不得不在一个冬夜里自杀了。莎士比亚妹妹的事实隐喻着无数具有文学天分的妇女的命运，她将注定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也就是说女性在历史上的从属地位严重阻碍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伍尔夫最后总结说：“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1](59)}她明确指出女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才能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才能有一种独立、一种自主、一种生活的保障。才能打破男性传统的限制，这是创作所需的基本条件。

在伍尔夫看来，男性社会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狭小必然限制心灵空间。所以“屋子”不仅仅是指砖石房屋，它还象征着女性的精神城堡和心境上的宁静淡泊。它暗示了妇女利用这种私人化空间来凸显“女性”自身。穿越时空，它可以使女性在这个封闭的自我空间里潜思默想、清理自身的异己内容，寻找自己独特的女性经验，确立自我、从文学传统中的“第二性”上升为创作的主体。

伍尔夫认为,女性言说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男性话语霸权,在提笔创作时,女性首先要转变现有的价值观,她呼吁女性将现有的男性语言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们思想的自然形态。伍尔夫倡导应该打破男权社会结女性作家表达肉体 and 情欲方面体验的禁忌。在自己的屋子里,进入女性作家视野的首先是她的身体,身体的描写、性的描写已经成为女性作家笔尖最锋利最微细的部分,赋予了她们建构自己的话语的起点。

二、对父亲由依恋到否定是女性主义精神的再现

在获得了写作必须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且深刻地意识到进行女性创作所必须的独立的心灵空间之后,伍尔夫由对父亲的依恋意识,转而对于父亲进行一系列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叙述。

伍尔夫的父亲是一个学识十分渊博的人,父亲对她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大,在伍尔夫的内心深处有着对父亲深深地依恋。可是伍尔夫母亲的去逝后,使得父亲无法从丧妻的阴影中走出来,形成了一种喜怒无常的性格,并对他的孩子造成了心灵的创伤。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以拉姆齐先生为父亲描画了一幅虚构的肖像,6岁的弟弟詹姆斯在对父亲表示对灯塔之行的渴望时,拉姆齐粗暴地向儿子证明说糟糕的天气将阻止这次航行。在狞笑着嘲弄詹姆斯之后,还用挑衅性断言来刺激儿子,以致于詹姆斯在十年后还指控父亲是一个爱挖苦人的“野蛮人”。父亲的言行使得女性意识日趋强烈的女性作家对父亲的不满进而产生了否定父亲的情结。

伍尔夫笔下的女性她们反抗父权的主要途径是在有限的空间内自主地选择婚姻。因为社会将异性恋的爱情变成了受父权控制的婚姻,女性无论如何选择似乎都难以逃脱父权制的魔掌,所以女性的反抗要不就是失败的,要不就是不彻底的。但作家笔下的女性已经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被压迫的地位,感受到社会对女性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并且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寻求解决的方法。

《远航》的主人公雷切尔·温雷克幼年丧母,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且生活圈子异常狭窄,这些导致了她在成年后,对社会、政治、爱情、婚姻、两性关系一无所知。后来雷切尔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不愿同他人一样虚度日,她追求生命中的真实,并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心声。雷切尔尽情地弹着钢琴,陶醉在音乐的世界中,她彻底地摆脱了失语的状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自此,她的反抗精神被激发出来,不再是模糊的、潜意识的,而是主动的、彻底的。在与作家黑韦特·特伦斯的交往中,促进了雷切尔对两性关系,以及婚姻爱情的认识 and 了解。特伦斯注意到自己和雷切尔的共同点,特伦斯把雷切尔放在和他平等的地位上去对待她的态度,使雷切尔对他萌生了爱意。这种爱是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让雷切尔受到了尊重,并使她既大胆又充满自信。就在雷切尔和特伦斯想要订婚之际,雷切尔陷入某种不安和恐惧之中。她既爱着特伦斯,渴望与他结合,可是又害怕婚姻会让她丧失她刚刚建立起来的自我意识。正如特伦斯所感觉到的一样,“她希望得到的确实比一个男人的爱要多得多——大海、天空。”^[2]

小说最后以雷切尔的突然生病死去为结局,这与伍尔夫当时的状况有关,一方面她已经到了要结婚的年龄,感到了社会对大龄未婚女性的压力,想要通过婚姻来获得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因为怕丧失自我而对婚姻产生恐惧。两方面的拉扯,所以即使是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雷切尔也只能通过死亡来逃离现实,获得解脱和幸福。作品最后以雷切尔的死亡作结,象征主人公自我追寻的夭折。

与雷切尔同样遭受婚姻困扰的还有《夜与日》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她出身于上流社会,容貌美丽、举止端庄,身边也不乏一些贵公子的追求。家族中人都希望她继承外祖父的诗才,而她自己喜欢天文学和数学。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让凯瑟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她本能地感到社会规范对女性的约束,也意识到如果她不想受到伤害,就需要躲避这些社会禁忌。另一方面,对于数学的热爱,使她自己反而倍加珍爱上了。权衡之下,凯瑟琳通过巧妙地分配时间这个办法来平衡外在自我和内在自我。在白天,她尽职地扮演着她“乖乖女”的角色,在夜晚,她则成为一个叛逆者,躲在自己的房间内攻读数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凯瑟琳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地增强,她的内心无时无刻不渴望着自由和独立。凯瑟琳想要逃离家庭,逃离日常生活的繁琐和无聊,婚姻就成了唯一的出路。此时的婚姻在凯瑟琳看来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和手段。本着这样一个信念,凯瑟琳顺应了父母的意思,选择了她第一个结婚对象——罗德尼。

在与罗德尼的交往中,凯瑟琳逐渐了解到罗德尼的为人,她也想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屈从于无爱的婚姻。可她终究清醒地认识到,罗德尼需要的只是一个依附于他、顺从他的妻子。和他的结合是会违背她的初衷的,她不但不能逃离原来的生活,还可能更深深地丧失自由与独立。因此,凯瑟琳拒绝了罗德尼,选择与自己思想相似的贫民男子拉尔夫走在一起。凯瑟琳选择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使她的自我意识得到尊重和实现,也表明了伍尔夫的不甘与颠覆的决绝。

伍尔夫笔下的女主人公们都具有比较强的叛逆性和女性意识，都努力尝试着以女性压抑已久的嘶哑之声，呼喊出生命中最本质的渴望。但在女性群体没有强大到足以与男权社会相抗衡的阶段，“女性”只能接受现实中诸多的不合理，尽管在内心深处她们从未真正的屈服过。只有当她们追求真实的内在自我时，才构成对男权社会秩序的否定。而一旦当她们的内心归于平静，留给自己的便只有孤独与痛苦。

在《墙上的斑点》里，伍尔夫借表现女主人公的内心，采用独白的手法，表达了她对男性世界的抗拒：“我”厌恶“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对男权社会的强烈反感，“我”宁可在内心中猜测斑点、独自冥想，也不愿走近墙壁去看清斑点。而且“我”觉得只有在进行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等个体精神活动时，才能拥有女性世界的真实和自由，才可以不受男权社会的干扰。

三、双性和谐的理想境界也是伍尔夫女性主义的追求

异性爱是父权社会以男性为本位构成的伦理观，而作为对传统男权观念的反抗，尝试了性别隔阂与歧视之苦的女性，一旦遭遇异性爱的无望与失败，就会很自然地把精神生活和情感欲望转向同性，产生所谓的妇性情谊。但它是对统治秩序的一种最根本的批判态度。也就是以女性情谊实现了对男性话语霸权的突围。

具有同性情绪的女性，其性倾向与她们在与男性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失望乃至绝望密切相关。考察伍尔夫的生平，可以看到她本人的同性情绪与年幼时达克沃思兄弟俩对她的身体侵犯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伍尔夫曾详细记叙了自己6岁时18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杰拉德·达克沃思对她的所作所为：“在餐厅的门外有一个供站立的大石板。有一次杰拉德·达克沃思将我举到台上，当我坐在那里时，他开始在我身体上摸索。我能记住他的手在我的衣服下面往前运行时的那种感觉，它坚定地、不断地越来越往下。我记得当时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停下。当他的手靠近我的私处时，我是多么僵硬与扭动不宁，但它没有停下来，还是摸索到我的私处。我记得对此的愤怒与不喜欢——如此不可言状与混合的感情能用什么词语来表达呢？它当时是一种强烈的刺激，我仍能回忆起来。”^[3]事实上，伍尔夫对那些凌辱的愤怒与憎恨，直到老年时都非常强烈。伍尔夫的这段经历，使她在心灵深处形成了对男人、对性根深蒂固的拒斥情结，而这种对男性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进而助长了她对女性爱的需求。她与姐姐范尼莎都有超乎寻常的友谊，她们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生活中友爱互助，试图结合起来以反抗男性暴君对她们的侵犯、蹂躏。受害女性之间的相互同情与怜惜，是女性“人”的意识完全觉醒之后的自觉行为。

女性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势必与主流意识构成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必然要遭遇到权力话语机制的压抑、扭曲。这时需要“双性和谐”的文化情调和氛围滋润，使双性关系现状达到理想的境界。

“双性和谐”即两性精神和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在这种理想的写作状态下，男女之间天然的差异，成为各自的性别优势，并且在宽容、和谐情状下、在彼此互补、逐步完善的过程中达到更完美和更高级的境界。荣格认为如果将女性和男性两方面的特征融合到一个人有意识的人格中，他就可能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

借鉴了荣格的理论，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明确提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4]这便是她的“双性同体”说。因此，女性在表达独立意识、进行文学创作时，可以“女人男性”。理想的写作状态，就是以性别的可换性来打破男性主义传统下女性永恒不变的性别模式，通过淡化性别意识、模糊性别差异等方法树立起性别平等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理论意味着超越性别角色认同，是一种两性精神和心理的文化认同。

这是伍尔夫首次比较充分地在其小说作品中表达她的双性同体观念，她的双性同体观念超载了旧女权主义单纯以男性为参照物的狭隘观念，对后代的妇女解放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更为成熟地展现伍尔夫“双性同体”观的是《奥兰多》，小说创造了一个不受时间和性别限制的主人公奥兰多。

最初的奥兰多是一个纯粹的男人，失恋后的奥兰多意志消沉，他自动请缨出使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大火之后，奥兰多离奇地成为了一个女人。但是奥兰多的变化只是生理性别上的变化，开始奥兰多对自己性别的改变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奥兰多乘船重返英国之后。随着身为女性经验的日渐丰富，奥兰多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男性强权是如何残忍地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她也敏锐地感受到了男性的虚伪，身为女性的重压让奥兰多喘不过气来，她甚至通过换男装来获得短暂的自由和快乐。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这种压抑的氛围更加沉重了。“两性的距离愈拉愈远，双方甚至忍受不了坦诚的交谈，只能小心翼翼地相互回避，极力掩饰……普通女人的生活就是连续不断地生育。”^[5]奥兰多此时也深感作为女人的压力。可是为了写作，她不得不“顺从时代精神，找一位丈夫。”^{[5] (141)}伍尔夫通过奥兰多的妥协，说明了一个事实：

在男权文化长期熏染下，妇女可能迫于生活的压力屈从于男性价值标准对女性的要求。

伍尔夫没有将男性彻底抹杀，她始终让奥兰多保持了一定的男性气质，以至于她与丈夫夏尔相遇时，夏尔冲他喊道：“你是男人，奥兰多！”^{[5](146)}而她在看到夏尔身上的女性特质时，也同时喊道：“你是女人，夏尔！”^{[5](146)}奥兰多头脑中的两性结合。这种结合使人们认识到女子是可以宽容、坦率如男子，男子亦可古怪、敏感如女子，同时也看到男女两性相互了解、交流和融合的可能。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社会男女二元性别论，在认同男女两性差异的基础上，注重两性气质的交融，为破除两性对立提供了理论上的解决方法。此外，双性同体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正如伍尔夫笔下的“双性人”奥兰多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杜撰的人物形象，不可能真实存在。

《到灯塔去》中的画家莉莉·布里斯科，她既是“新女性”的代表，也是一位精神层面上的“双性人”。

首先，使莉莉的创作和生活蒙上阴影的是来自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贬低和排斥。第一个代表这种文化来自直接抵制排斥莉莉的就是学究坦斯利，在他看来，文学与艺术都是从属于男性文化的一部分，这个领域是不允许女性侵入和污染的。在面对莉莉这样企图在男性文化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富有威胁性的女性时，他本能地采取了攻击的态度。这种攻击显然取得了效果，莉莉尽管主观上不认同他的这种看法，但这句话却始终回荡在她的耳畔，让她耿耿于怀。

如果说坦斯利的话只是让莉莉心神不宁，那么拉姆齐先生的存在则直接影响了莉莉的创作。拉姆齐夫人的过世使拉姆齐先生将莉莉当成了替代物。他那种渴求同情和怜悯的眼神使莉莉极力躲闪，却又无处可躲，“他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紧紧地纠缠着你。他把一切搅得面目全非。她看不见色彩，也看不见线条。”^{[2](133)}莉莉很快便向拉姆齐先生投降了。

使莉莉困惑的不仅仅只有来自于男性的排斥与贬低，同为女性的拉姆齐夫人同样使她陷入到矛盾之中。拉姆齐夫人，一方面，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丈夫，具有一些女性优良的品质。另一方面，她对丈夫一味地妥协付出，丝毫没有任何独立的尊严和完整的人格。她经常以男权思想传播和宣传者的面目出现，莉莉尽管多次嘲讽了她，并拒绝了她为自己所设计的人生计划，但同时又不免受她影响。直到拉姆齐夫人去世，莉莉的生活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莉莉对拉姆齐夫妇态度的变化勾勒出了她在传统思想与新女性思想之间挣扎的轨迹，她的困惑源于此，反抗也同样源于此。传统的男权思想既引发了莉莉对于自身能力的怀疑，也导致了莉莉创作的停滞不前，激起了莉莉反抗的意志。她先是拒绝了拉姆齐夫人关于结婚的建议，企图通过拒绝婚姻来为自己的绘画创作赢得更多的时间，而后尽管受到各方打压，她始终都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因为处在男权统治社会的边缘位置，她手中的画笔成为了她唯一能抒发自我、表述新生的方式。她必须依靠它才能战胜他人，成就自我。

莉莉历经数载，画作始终未能完成。因为她始终无法将自己身上敏锐、直觉的女性原则和尊重事实的男性原则协调一致。关键时刻，拉姆齐夫人的形象和拉姆齐先生的形象融为一体，象征“双性同体”的灯塔的光芒使莉莉获得了精神启迪和创作灵感，并最终完成了画作。伍尔夫认为只有当两性因素融为一体时，一个人才会才气横溢，充分发挥其所有功能。

伍尔夫的创作展示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让我们看到了新旧两种思想在她头脑中斗争的轨迹，也使我们看到女性文学和主流文化分庭抗礼的趋势。作品中鲜明的女性意识提醒我们：女性自我确认与成长之路还很漫长，颠覆和否定父权传统文化只是第一步，创建一个两性和谐的新文化是每一个女性主义者应该共同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王远译. 一简自己的屋子 [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69.
- [2]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马爱农译. 到灯塔去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5.
- [3] [英] 林德爾·戈登·伍厚悛译.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 [M].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78.
- [4] [瑞士] 荣格·成穷，王作虹译.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塔维斯托克讲演 [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95.
- [5]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林燕译. 奥兰多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32.